

人面弓形格铜剑研究

彭长林¹ 付 珍²

(1.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湖南长沙 410081;

2.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 广西南宁 530001)

内容提要:通过对人面弓形格铜剑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它是流行于战国至西汉中期的一种形制特殊的兵器。各地发现的这类铜剑应该都是由滇东南、桂西北地区的句町文化制作并传播到其他地区,其纹饰包含着太阳神鸟崇拜的宗教信仰。

关键词:人面弓形格铜剑 型式 年代 句町文化 太阳神崇拜

中图分类号:K871.3

文献标识码:A

人面弓形格铜剑是分布在两广和越南北部的一种形制和纹饰独特的青铜短剑,虽然分布范围较广,但出土数量很少,迄今只发现不到20件。邓聪^[1]、蒋廷瑜^[2]两位先生曾有多篇论文探讨其型式、年代、渊源等问题。近年来,广西、广东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多件此类铜剑,使我们对这一文化内涵丰富的特殊兵器可以进一步开展研究。本文在全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其型式、年代、起源、传播、纹饰内涵等问题做一综合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型式与年代

邓聪将已发现的弓形格剑分为三式,Ⅰ式有木罗剑,Ⅱ式有石滩剑、苏元山剑,Ⅲ式有石壁剑、东山剑,并认为三者关系为Ⅰ→Ⅱ→Ⅲ^[3]。蒋廷瑜则认为三式之间区别明显,三者是何种关系目前很难说得清楚^[4]。由于此类铜剑绝大多数为采集品,没有时代和文化背景,要想理清它们的早晚关系和演变规律恐非易事。不过通过对器形和纹饰的整体分析,还是可以找出相互之间的一些演变轨迹。

从整体特征来看,邓聪的分类是较为准确的,不过它们形制差异较大,除了较为复杂的前后演变关系外,还存在一些同时并列关系。笔者将式改为型,根据茎、格、刃形制的差异分为四

型,部分型下根据茎首和格的不同分出亚型,根据格和纹饰的变化分式。

A型 茎首开叉,扁茎,无格,格部中央凸起三角形,弧刃。仅有木罗剑1件。茎部为阴线卷云纹,刃部顶端中央菱形框内为人面纹,两侧为Y形羽枝纹,上端为鸟首,下连竖向卷云纹带,底端合成一倒三角形。通长23.2、茎长6.2、身长16.6、腊宽4.8厘米(图一:1)。出土于广西柳江县木罗村一窖藏,同出铜甬钟、喇叭形器各1件^[5]。

B型 弧形茎首,上天下小的近柱形扁茎,弓形格较宽,上翘明显,不向外突出而与刃基部宽度相当,曲刃。仅有百色河2号剑1件。茎部正中为一顶部尖状、中间有凹槽的屋形图案,下部为一多层V形图案,其余地方填满勾连卷云纹、多线三角纹等;刃部上端为一面人,头戴两边上卷的“人”字形冠,两侧纵列三角纹,耳戴下垂至肩的重圈、中间带轴条的双环耳饰,下接长栅栏状纹,两侧各有六个半椭圆形突出,栏内满饰多线三角纹,下端为一箭头形,箭头下为一蛙形动物,两侧似为简化的卷云纹。通长32、腊宽5.8厘米(图一:2)。出水于广西右江百色市河段^[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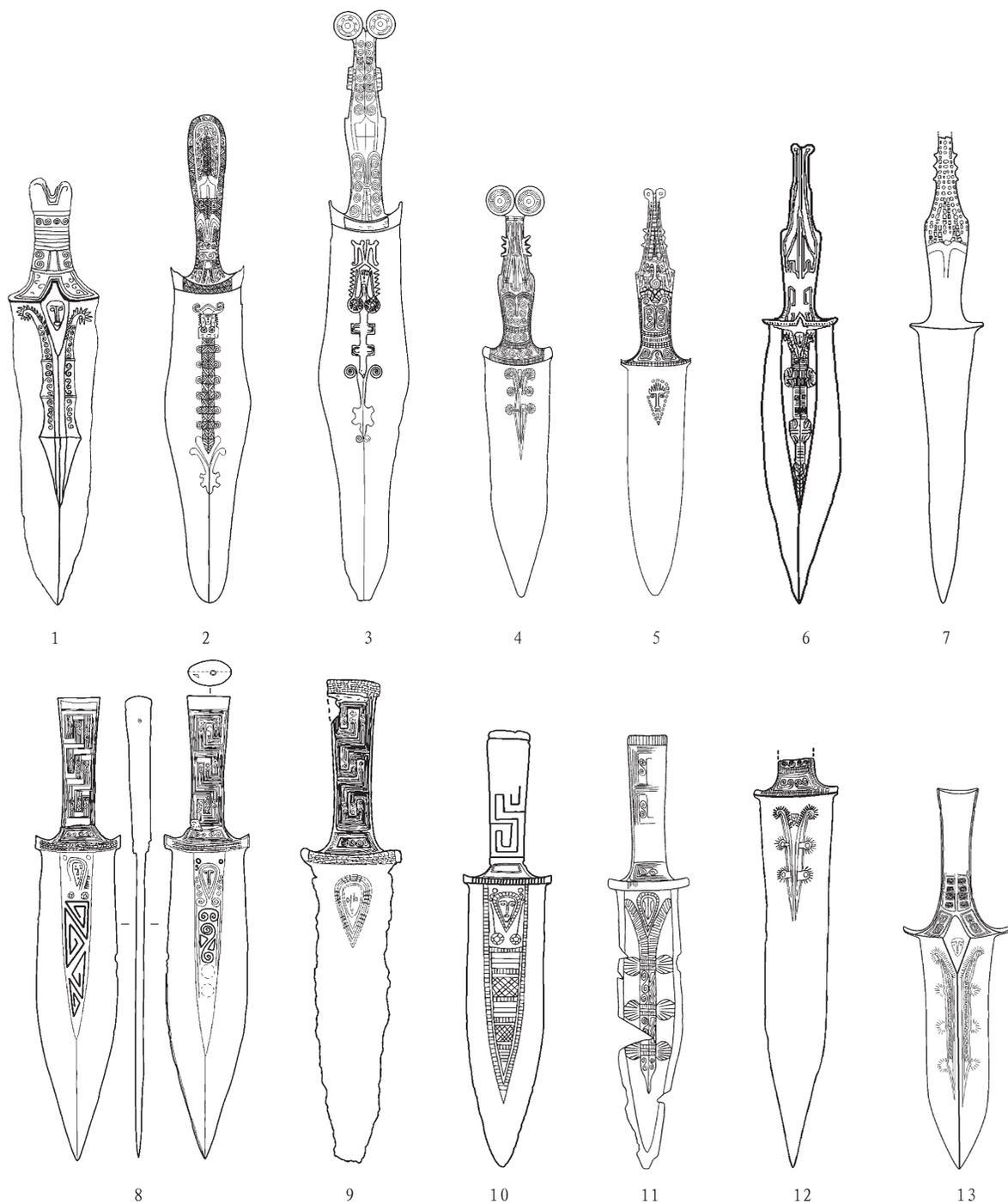
C型 双环首,弯曲扁茎,茎部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内收梯形,除个别外绝大部分两边有向外突出的“山”字形锯齿,下段为束腰柱形,茎

收稿日期 2023-03-28

作者简介 彭长林(1969—),男,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西南及东南亚考古。

付 珍(1970—),女,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馆员,主要研究方向:文物保护及库房管理。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大陆的史前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20BKG006)。



图一// 人面弓形格铜剑

1.A型(木罗剑) 2.B型(百色河2号剑) 3.Ca型I式(石滩剑) 4.Ca型II式(隆平剑) 5,6.Cb型I式(百色河1号剑、苏元山剑)
 7.Cb型II式(七塘剑) 8—11.Da型I式(石壁剑、仙坑村1号剑、贵港剑、东山剑) 12.Da型II式(百色河3号剑) 13.Db型(邕江剑)
 (图片来源:除9、11采自[1]a外,其余根据照片清绘)

部纹饰复杂。按环首大小分为两亚型。共发现5件。 I式:弓形格上翘明显,不向外突出,刃部有Ca型:双大环首,茎部“山”字形鉏牙规整,弓戴冠和耳饰的复杂人面纹。仅有石滩剑1件。茎部

上端和下端都有卷云纹;刃部顶端有戴冠和耳饰的复杂人面纹,头顶两对称高枝装饰,头、颈两侧纵列三角纹,耳戴下垂至肩的重圈、中间带轴条的双环耳饰,人面下连凹体“”形,下端为鸟首,其下为一凹体蛙形动物,上、下端左右歧出上大下小的卷云纹。通长39、茎长12.7、身长24.3、腊宽6.3厘米(图一:3)。采集于广西灵山县石塘乡石滩^[7]。

Ⅱ式:弓形格上翘不如Ⅰ式明显,微向外突出,刃部近直。刃部人面纹简化为三角形,羽枝纹只占刃部一小段。仅有隆平剑1件。两面纹饰相同,茎部上段为长弧线与长槽组成的奇特图案,两边为长椭圆,中间为细长山形,下段在栉纹边框内分三组填饰云纹;刃部纹饰只占刃部一小段,上端为Y形羽枝纹,分三段向左右伸出羽状球纹,羽枝中间的人面纹简化为三角形,一面三角形为阳纹,另一面为阴纹。通长24.2、腊宽3.95厘米(图一:4)。采集于广西右江田阳县隆平村河段^[8]。

Cb型:双小环首,茎部“山”字形鋸牙简化或消失,弓形格较窄,上翘不明显,微向外突出。按刃部特征分为两式。

Ⅰ式:弧刃。有百色河1号剑和苏元山剑2件。

百色河1号剑,茎部纹样分为上、下两段,上段为长弧线与内填横线的长槽组成的图案,中间为细长的尖状山形,两边向上一一直延伸到茎首圆环下,底部中央连接一个下端为圆球形的细长柱,两边也向下连接近椭圆形,山形和椭圆形上还有阳线卷云纹,下段在栉纹边框内分三组填饰卷云纹;刃部上端为一倒三角形人面,人面下巴尖削,头发为火焰状上冲的长三角形。通长24.5、茎长10.6、腊宽3.4厘米(图一:5)。采集于广西右江百色市河段^[9]。

苏元山剑,茎部为较简化的几何纹;刃部人面纹为较小的光头,两边斜出Y形大羽枝纹,羽枝两边有3个大羽状球形。通长29.4、茎长13.9、身长17.2、腊宽5厘米(图一:6)。采集于广州暹岗苏元山^[10]。

Ⅱ式:窄长直刃。仅有七塘剑1件。茎首残,剑身较长,刃部窄长近直,其余与百色河1号剑相似。纹饰也大体一致,但不如后者精致,相对简化,因长期被河水磨蚀而模糊不清,剑身人面纹仍隐约可见。通长30.4、身长18.2、腊宽2.7厘米

(图一:7)。采集于广西右江七塘河段^[11]。

D型 平首,空心或实心微束直茎,弓形格上翘不明显,弧刃。按格部特征分为两亚型。

Da型:较宽的弧状弓形格,微向外突出。按刃部特征和纹饰差异分为两式。

Ⅰ式:弧刃,人面纹写实,面积较大,头部周围有简化的冠状纹样,几何纹或羽枝纹占据刃部长度2/3以上。共发现8件。

石壁剑,椭圆形柱状中空茎,顶端封闭,中部微束;宽扁弧刃,最宽处在中部,中部起脊。茎部以深槽形成曲折的回纹,回纹内满填五、六道直线纹和卷云纹,下部有深槽围成长方形框,内填横置卷云纹;格部有五道平行线纹,间填锥刺的连珠纹;刃部两面有人面纹,两侧有卷云纹、羽状纹、圆圈纹等,其下一面为三角形卷云纹,另一面为弧线卷云纹。通长27.6、茎长8.1、身长18.3、腊宽4.9厘米(图一:8)。采集于香港大屿山石壁^[12]。大湾剑采集于香港南丫岛,剑身保存不佳,已遗失^[13]。过路湾剑采集于香港赤立角岛过路湾,剑身残缺^[14]。二者形制均与石壁剑相似。

仙坑村1号剑,形制与石壁剑相似,只是刃部扁平无脊。茎部、格部纹饰也与石壁剑相似;刃部只有倒三角形人面纹,人面外有四重有纵向短线的平行弧线,似为发冠。通长29.5、茎长10.8、腊宽6厘米(图一:9)。2号剑仅余茎部,形制、纹饰与1号剑一致。二者同采集于广东高州市南塘仙坑村^[15]。

贵港剑,茎部以宽阴线形成曲折回纹,回纹内纹饰模糊不清;格部为栉纹;刃部中间为一栉纹围成的倒长三角形框,框内顶部中心为人面纹,人面外为一栉纹框形的头饰,耳戴下垂至肩的重圈、中间带轴条的双环耳饰,其下为纵列的栉纹和多线三角纹方框。通长26.25、腊宽4.45厘米(图一:10)。采集于广西贵港市^[16]。

东山剑,形制和茎部纹饰与石壁剑相似,刃部两面有倒三角形人面纹,用连珠纹做外框,两侧斜出Y形羽枝宽带状纹,内填卷云纹、三角纹、栉纹,左右伸出三组羽状扇形光芒纹。通长27.7、茎长8.6、身长17.4、腊宽4.6厘米(图一:11)。出土于越南清化东山,同出铜戈和矛各1件,可能为同一墓葬随葬品^[17]。象山剑采集于越南海防象山^[18],形制与东山剑相似。

Ⅱ式:剑身较长,直刃,人面纹简化,面积很小,羽枝纹也较小,仅占刃部长度一小段。仅有百色河3号剑1件。茎部残,仅余一小段,残存茎部

下段纹饰与隆平剑相似,在栉纹边框内填饰卷云纹;刃部上端为较小的Y形羽枝纹,仅占刃部长度一小段,分三段向左右伸出羽状球纹,中央为一小三角形,一面为简化人面纹,面积很小,一面为素面。通长25.5、腊宽5.5厘米(图一:12)。采集于广西右江百色市河段^[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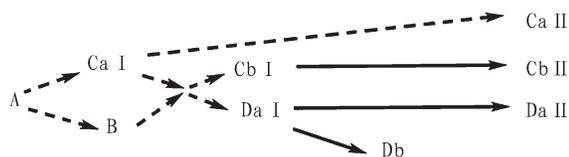
Db型:较窄的弓形格,格部中间凸起呈三角形,上翘明显,明显向外突出。仅有邕江剑1件。茎部以多重直线分为两列多行的方框,每个方框内为多重细线卷云纹;刃部顶端中央为倒三角形人面纹,人面纹简化为光头,两侧斜出羽枝纹,内填卷云纹,左右伸出三组羽状球形纹。通长23.6、腊宽4.2厘米(图一:13)。采集于广西邕江南宁市河段^[20]。

各型式特征虽然差异较大,但形制和纹饰仍有一些隐约可循的演变规律。从形制看,格部变化较为明显,有无格→不向外突出的弓形宽格→微向外突出的弓形宽格或窄格→明显向外突出的弓形窄格的发展序列,这与滇文化铜剑从无格向一字格演变的规律大体相似,刃部有弧刃→直刃的变化。纹饰也有相应的演变规律,大体与纹饰从写实到复杂再退化的一般发展进程吻合,剑身羽枝纹有光杆羽枝→向两边伸出三组大羽状球形的羽枝→向两边伸出三组小羽状球形的羽枝的发展序列,人面纹也有写实的光头人面→复杂头饰的人面→简化头饰的人面→简化的光头人面或三角形的发展序列,与形制的发展序列基本可以对应。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弓形格剑的早晚关系:A型的格部和纹饰都处在最早的阶段,是所有弓形格剑中最早的样式;其次为B型和Ca型I式,为不向外突出的弓形宽格,无羽枝纹为其变体,人面纹写实,佩戴复杂头饰,二者纹饰布局、风格和诸多细节都相似,并且均为较为罕见的曲刃,时代应该一致;Cb型小环首未见于其他器物,应是Ca型大环首的退化形式;Cb型I式、Da型I式为微向外突出的宽格或窄格,羽枝纹伸出大球形,其中苏元山剑和东山剑剑身纹饰一致,说明这两式年代相当,这两式的人面纹头饰与B型和Ca型I式相似而略简化,应该是二者的后续样式;Db型格部明显向外突出,羽枝纹伸出小球形,从Da型I式演变而来;Ca型II式和Da型II式刃部纹饰与Db型I式相似,但更为简化,人面纹退化为三角形,羽枝纹已不像其他羽枝纹占据剑身大部分,仅分布在基部,且为直刃,应较Db型略晚;Cb型II式的窄直刃也是较晚时期特征。

不过,各型之间虽有演变关系,但也吸收了不少其他铜剑的因素,因此形制差异较大。此外,目前发现的弓形格剑数量还是太少,有些特征为间断性出现,并不是完整的连续演变关系,如A型与B型、Ca型I式形制和纹饰差异较大;Ca型I式与Cb型I式剑茎演变关系清晰,但剑身形制和纹饰相去甚远;Ca型I式和II式剑身纹饰也有明显缺环;另外格部中央凸起的三角形也只在部分型式出现,看不出彼此之间的关联性(图二)。

人面弓形格铜剑的年代迄今尚无定论,这与绝大多数遗物为采集品有关,没有共出物和文化背景可以对照。仅有少数有共出物,东山剑共出铜戈为典型东山文化器物,其年代上限有研究者认为可能在西汉中期^[21]。不过有的研究者将所参照的云南长胡有翼戈的出现时间定在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则略显偏晚^[22],这类戈在相当于战国中期的羊甫头第一期M19就大量出现^[23],因此这一年代判断仍有重新讨论的必要。石壁剑共出铜矛约为春秋中期,苏元山剑共出铜戈大致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24],木罗剑共出甬钟为东周时期,一般认为它们的年代大致为战国时期^[25]。但以上三剑都没有准确的出土单位,要确定铜剑的年代主要还应从其自身特征和相关的文化背景来分析。

首先,弓形格剑为柄、身合铸,可直接握持使用,这种形制与商末至东周北方草原地区和战国至西汉的西南夷地区为同一剑系,而与岭南粤东一带的东周式铜剑区别开来^[26]。战国西汉时期云贵高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大量出土的铜剑均为柄、身合铸的形制,因此,人面弓形格剑的来源应该与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关系更为密切。石滩剑双大环首的特征在滇西北剑川鳌凤山^[27]、宁蒗大兴镇^[28]、永胜金官龙潭^[29]和川西南盐源老龙头^[30]的铜剑上有出现,有学者认为它们的年代均为西汉时期^[31]。出土这类铜剑最多的盐源老龙头墓地在汉代墓葬中未见双大环首剑出土,因此双大环首铜剑的年代可



图二// 人面弓形格剑型式演变示意图
(虚线表示间接传承关系,实线表示直接传承关系)

能会早到战国时期^[32]。石滩剑的双大环首既然仿自滇西北铜剑,时代要稍晚一些,而且曲刃的特征应该仿自滇文化“一”字格剑,后者从战国晚期开始出现,西汉以后大量流行开来,综合来看,Ca型I式的年代约在战国晚期左右。

其次,从格部来看,Cb型与D型格部两端向外突出,除了部分格部较宽和呈弓形的特征外,其余与滇文化常见的一字格铜剑相似,明显受到后者的影响。Da型I式各剑虽然相距较远,但形制和剑茎纹饰基本一致,人面纹也差距不大,应该是同一时期所铸,邓聪认为石壁剑和东山剑有可能是同一时期同一工匠集团所铸造^[33],考虑到这种剑的西南因素,石壁剑等珠江三角洲的弓形格剑来自东山文化的可能性更大(后文详述)。广西贺县龙中岩洞葬^[34]的石寨山型铜鼓和长沙树木岭墓^[35]的人形茎铜剑都是典型东山文化遗物,两墓时代均为战国晚期,说明战国晚期东山文化与两广和湖南越文化之间的往来较为顺畅。此外,石壁剑和苏元山剑的共出物中并未发现汉代器物,而秦汉以后这里绝大部分为汉文化因素,因此二者年代应该早于秦汉时期。因此,Cb型I式和Da型I式的年代也应在战国晚期,这与B型和Ca型I式的年代相似,从型式分析来看它们之间存在先后演变关系,这种矛盾之处在于B型和Ca型I式的器形和纹饰太特殊,其曲刃及人面特征与前、后型式均不同,或是一种特例,应该还有更早、更典型的遗物。Cb型II式和Da型II式剑身纹样风格和布局都接近“一”字格剑刃部的卷云纹,而装饰这种卷云纹的“一”字格剑在西汉中期的滇文化中大量出现,西汉晚期迅速被铜柄铁剑取代,二者刃部较长和近直刃的特征也与“一”字格剑相似,年代大致在西汉中期左右。Ca型II式纹饰是较晚时期的特征,与前二者年代相当。

由此可以推断各型式出现的大致年代,A型约为战国早、中期,B型、Ca型I式、Cb型I式、Da型I式大致在战国晚期,Db型约为西汉早期,Ca型II式、Cb型II式、Da型II式约为西汉中期。西汉晚期西南和越南北部铜器已被汉式铁器取代,人面弓形格铜剑也随之消失。从数量和型式来看,战国晚期无疑是弓形格剑发展的高峰期,不过由于发现的数量还是太少,是否如此仍难以确知。

二、文化归属

邓聪将弓形格剑的分布区域作为一个文化圈来解释,香港周围一带可能是其分布较密的范

围^[36],换言之,他认为弓形格剑是由彼此有相互交流的不同文化分别制作的,而珠江三角洲一带是弓形格剑的分布中心。这一论断仅仅基于早期发现的数件弓形格剑而得,现在来看还有进一步修正的必要。

从上文分析来看,各地弓形格剑虽然相距遥远,但形制和纹饰相似之处颇多,甚至部分细节也一致,而这些承载着一定精神信仰的复杂形制和纹饰显然是由拥有同一文化传统的人群制作,而不可能由不同区域的人群分别制作。由此笔者认为,各地出土的弓形格剑应是从某一区域向外输出的结果,而不是不同文化受到某一文化影响后在本地制作的。

弓形格剑既然归属某一文化,那么这一文化的具体范围在哪里呢?首先,从出土地点来看,弓形格剑分布在西江沿线和越南北部至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这种分布特点显示出它应是通过西江水路和越南北部至珠江三角洲的海路进行传播。而这两条线路最有可能的出发地就是滇东南和桂西北相连的山区地带,从右江而下西江和从红河支流泸江、锦江而下红河至越南北部沿海都十分便利。弓形格剑出土数量最多的区域是百色至田阳的右江河段,这里共打捞出水5件,而且种类较为齐全,B、C、D型均有发现,因此,这里可能是弓形格剑的制作和分布中心,但这一带战国秦汉时期并不发达,推测它们应该是从更上游的区域被河水带到一带水流较平缓的河道中。位于右江源头的广西西林和云南广南一带,在战国西汉时期曾是句町王国的中心区域,西汉中晚期为其鼎盛期。广西西林普驮出土过用4件互相套合的铜鼓作为葬具、随葬大量青铜器的铜鼓墓^[37],还有已经被毁的鎏金铜棺。云南广南牧宜遗址面积很大,有居住区、墓葬区、冶炼区,发现随葬铜鼓的大型墓葬,出土过开化鼓、广南鼓、牧宜鼓等最精美的石寨山型铜鼓^[38],可见其文化之强盛。由于以上墓葬的年代均为西汉晚期以后,汉文化特征已居主导地位,弓形格剑已经消失,在这些墓葬中并未出土弓形格剑。不过,从弓形格剑独特而复杂的纹饰来看,它应该隶属一个较为强盛的民族,拥有一套明确而复杂的信仰体系,这与句町民族的分布地域、时代和发达程度可以对应。

其次,诚如邓聪所言:“人面弓形格铜剑是汇合越民族人面纹的特色,再揉合西南一带战国短剑之色彩而成。”^[39]从弓形格剑的特征来看,它

是糅合了诸多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而成。双环首源自滇西北青铜文化,空心柱状茎、格两端向外突出、曲刃或直刃与滇文化“一”字格剑相似,剑茎和剑身几何纹的纹样、风格、布局也都接近“一”字格剑,人面纹与广东曲江石峡和香港大屿的扁茎剑、广西罗泊湾汉墓和普陀汉墓的羊角钮钟人面纹相似,弧刃则接近越南东山文化的铜剑风格,显然它是将西南、越南北部、华南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结合而形成的。因此它不大可能在西南、华南和越南北部的核心区域出现,而最可能出现在三大文化区的交接地带,滇东南、桂西北刚好能满足这一条件,这也与桂西北发现数量最多相吻合。

作为几大文化区的交接地带,滇东南、桂西北的青铜文化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区域特色,而是周边文化传播至此地后杂糅而成的。滇池区域的滇文化和红河平原的东山文化之间关系密切,往来频繁,“一”字格剑、戈、不对称形钺、尖叶形锄、石寨山型鼓、提筒等铜器都在两文化中出现,是彼此相互影响的结果,而滇东南作为二者的中间区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类遗物。华南青铜文化特色的铜甬、铜甬钟在广西田东南哈坡、大岭坡墓葬的出土,说明华南越文化已影响到桂西北一带^[40],而这也是华南越文化典型器物在西北方向所到达的最远位置。滇西北青铜文化的特征对本区域影响不大,但云南泸西大逸圃和石洞村墓地所表现出的明显游牧文化特征显示出氐羌族系的一支已在滇东南地区建立政权,他们可能是与句町、夜郎为邻的漏卧部族^[41]。万家坝型铜鼓的起源和分布中心在滇中偏西地区,它主要的传播方向是东南向,越南、文山一带发现二十多面,都是从楚雄、大理等地传播过去的^[42]。羊角钮钟也沿万家坝型铜鼓相同的方向传播,在滇东南的广南、麻栗坡、西林、越南东山文化部分遗址和华南的容县、贵港、浦北、广州等地都有出土^[43],也有从滇中偏西至滇东南后下红河水路至越南北部,再经海路至华南的路线,部分与弓形格剑的传播路线重合。从文化特征、文献记载和语言等多方面的综合分析来看,句町民族应是由百越和百濮两大族系融合而成,而以百越族系为主^[44],这一民族结构的复合性与文化的多样性一致,也与弓形格剑包含多种周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的特点相吻合。弓形格剑形制多样的特征应该与句町民族在不同时期接受了来自不同区域文化铜剑的影响有关,导致其型式变化较大,不够稳定。

此外还可以从其他相关遗存来佐证这一结论的可靠性。云南麻栗坡新堡寨羊角钮钟有带“八”字形头饰的人面纹^[45]。云南广南阿科乡普圈村采集的1件铜当卢(图三:5)^[46],正面为倒三角形的人面纹。云南个旧倘甸标杆坡采集的1件陶模^[47],一面为同心圆纹,另一面为残存的人面纹。云南元江打篙陡墓地M25出土的1件铜铃也装饰有人面纹^[48]。广西西林县采集的两件铜匕首,一件茎首为人头形,另一件茎首开叉^[49]。以上诸器都与弓形格剑有相似的人面纹或形制,人面弓形格剑起源于此地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笔者认为,各地发现的人面弓形格铜剑应该都是由滇东南、桂西北地区的句町文化制作并向外传播的,有两条传播路线:其一通过西江水道从百色经南宁、贵港至珠江三角洲,其二通过红河及其支流下到越南东北沿海,经北部湾、海南岛至珠江三角洲。

三、纹饰内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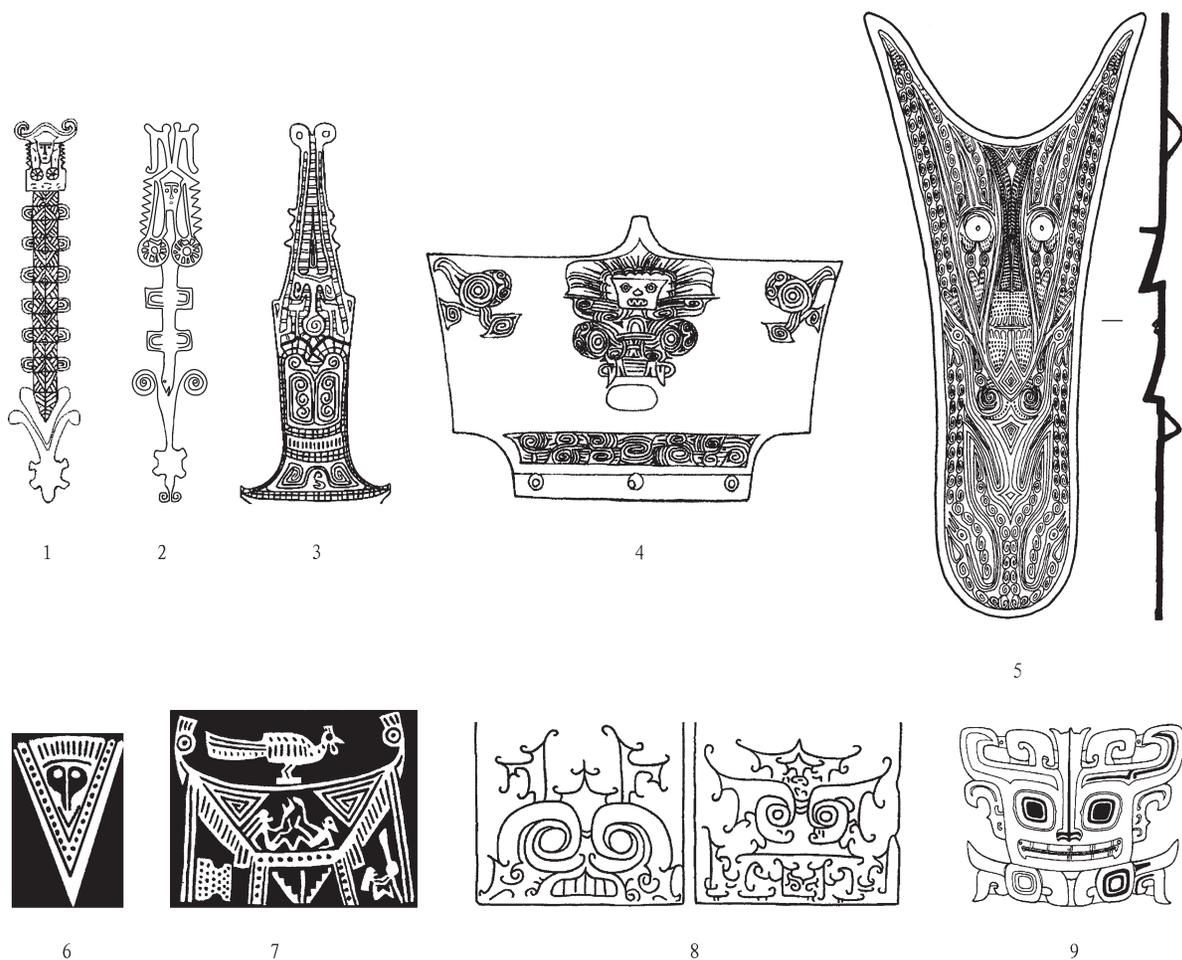
人面弓形格剑的剑茎和剑身上分布有复杂的纹饰,特别是在仅两三厘米宽的剑茎上密布着细如发丝、排列有序的繁复几何纹,制作难度极高,而且不少弓形格剑的纹饰基本一致,甚至细节的刻划都相似,应该蕴含着社会广泛认同的同一精神信仰。蒋廷瑜对这些纹饰描述十分详尽,但对其内涵未作任何解释^[50]。邓聪认为人面纹可能代表了一些不轻易改变之精神信念,也许是“人间形鬼神”的象征,人面两边的羽枝纹则代表了一种向四方发射光芒或者是“气”的表现^[51]。由于绝大多数弓形格剑并非发掘出土,在不了解其文化背景又无文献可证的情况下,要完全理解弓形格剑复杂纹饰的文化内涵显然是徒劳的,如此含糊的粗略解读实属无奈,而无法验证的随意释读也毫无意义。从纹样的布局来看,各类弓形格剑虽然存在一些差异,但整体布局、风格和特征基本一致,表现的是同一题材。此外,人面纹与其他纹饰的组合不只在弓形格剑上出现,还在其他文化的器物上有类似纹样出现,对纹样的内容甄别及其渊源和相关材料的综合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弓形格剑纹饰所蕴含的文化意味。

两羽枝夹人面的构图是这一题材最基本的要素。人面居于最显眼的核心位置,除常见的光头外,有的有上冲的头发或带帽和头饰,显然它不是普通人而是某种神灵的人格化形象。百色河2号剑和石滩剑的人面刻划较为翔实,二者均带冠,百色河2号剑人面的冠两边卷曲上翘(图三:

1),石滩剑人面的冠顶向上斜伸出一对弯曲卷钩的K形饰(图三:2),帽檐两边下垂部分呈纵列锯齿形,两耳带垂肩太阳形耳饰,石滩剑茎首也为太阳形双环。Da型I式各剑有围绕人面的一圈、两圈或数圈中间填横线的弧线,也有冠的意味,有的也有垂肩太阳形耳饰。木罗剑、苏元山剑等人面则为光头,但光头人面上方的格部中央都有凸起的三角形框,其他非光头人面则没有,说明三角形框应为冠的象征性表现形式。从人面所佩戴的太阳形耳饰和茎首太阳形双环来看,他最有可能是象征太阳的神祇,人面两边纵列的三角纹或是太阳光芒的象征,两耳垂肩的太阳形耳饰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含义, Da型I式各剑人面的环绕弧线更加形象地表现出太阳光晕的特征,那么人面很可能是带冠的人格化太阳神形象。羽枝为上端弧形外倾、左右对称的两枝,整体呈Y形,两

边带有向外突出的对称羽状球形,内部填平行直线或卷云纹,后期简化为仅具形状,没有细节表现,有的以卷云纹或几何纹代替。年代最早的木罗剑的羽枝顶端为头上长满羽毛的鸟首侧面形象,因此所谓羽枝应为两只拉长的鸟的写照,羽枝代表鸟的身体,两边的羽状球形表现的是鸟的翅膀。石滩剑人面下为一飞翔的鸟纹,鸟首有写实的眼睛和喙,身体部分以抽象的 \neq 形纹表现,两边突出的部分似为表现两对翅膀,可能为双鸟合体之意,有双鸟载人飞翔的意味,与羽枝夹人面的内涵一致。人面周边或双鸟下端的卷云纹似乎暗示其在空中飞翔。因此,这一题材的内容应该是表现双鸟载负太阳神在天空飞翔的场景。

这一题材与南方地区普遍流行的太阳神崇拜一脉相承。高庙文化中有不少飞鸟载日的纹



图三// 与太阳神崇拜相关的纹饰

- 1.百色河2号剑剑身纹饰 2.石滩剑剑身纹饰 3.百色河1号剑剑茎纹饰 4.瑶山玉冠形器(M2:1) 5.广南阿科乡普圈村铜当卢
6.玉缕鼓鼓面翎纹 7.玉缕鼓鼓面房屋纹饰 8.日照两城镇玉圭兽面纹 9.广汉三星堆铜兽面(K2:231)

饰,这种鸟、日结合的太阳神信仰从高庙文化向东传入东南、向南传入华南^[52]。东南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多有双鸟夹日的纹样,良渚文化逐渐形成了太阳神与鸟神结合而成的人格化羽冠太阳神形象^[53],其所戴的羽冠可能象征着太阳光的线^[54],冠的形状为极具特色的“介”字形。此后在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也普遍发现不同类型的鸟日形象,都可能渊源于良渚文化^[55]。良渚瑶山玉冠形器刻划的神人兽面纹顶部中央的三角形凸起、神人兽面与两边双鸟的图案是这一题材模式化构图的典型代表(图三:4)^[56]。青铜时代这一文化传统仍有大量遗留,长江流域普遍发现的羽冠神人像是古人观念中主要神祇,如太阳神或社神,反映了长江流域源远流长的偶像崇拜文化小传统^[57],吴越地区顶部立鸟的青铜杖也可能是太阳崇拜的物证^[58]。

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华南、越南北部、西南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长期持续的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了一条自东南经华南和越南北部到西南的文化传播路线,呈现出明显的文化相似性,也是先秦两汉时期百越族群的分布范围,笔者称之为“百越文化传播带”。诸多相似的文化因素散布于这一文化传播带上,太阳神崇拜的题材在各种器物上都有表现。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是在东南吴越文化的影响下兴起的,而东山文化典型器物石寨山型铜鼓纹饰的内涵也渊源于东南地区鸟、日结合的太阳神信仰,鼓面太阳纹芒间的所谓翎眼纹实际是一个头发上冲的三角形人面纹(图三:6)^[59],表现的是光芒四射的人格化太阳神形象;玉缕、黄下等铜鼓鼓面纹饰以长脊短檐的干栏屋为中心,屋顶两端有鸟头装饰,整体形似双鸟,房内存放有铜鼓、舂堂等物,侧面弧形顶两端有大圆圈纹,墙面也有成行成列的圆圈纹,表现出其与太阳崇拜相关的神圣性,这些房屋应是象征太阳神栖居的空间,与良渚文化双鸟之间的太阳神结构一致(图三:7)^[60]。西南岩画系统、东山文化和石寨山文化的青铜器上有大量蹲踞式人形图案,渊源于长江流域蹲踞式神人偶像崇拜,同样包含着太阳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弓形格剑的纹饰也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散播和再现,冠和耳饰都表明了人面的太阳神形象。百色河2号剑人面两端上卷的“人”字形冠与良渚文化等的神人兽面纹头上所戴的“介”字形羽冠类似,无羽冠的人面上方的三角形凸起与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羽冠

中间的凸起相似,两边夹双飞鸟,其布局也与良渚文化神人兽面和两边的双鸟一致。山东日照两城镇发现过1件刻划兽面纹的玉圭,据研究属于龙山文化早、中期^[61],兽面上戴着与百色河2号剑类似的两端上卷的“介”字形冠(图三:8),其中一面兽面冠顶两边对称的卷钩形纹样与石滩剑冠顶的K形饰相似,虽然更复杂一些,但总体风格和造型是一致的。这种左右歧出向上卷曲的纹样从河姆渡文化到历史时期都有发现,可能是对鸟式的简化样式,表现的是太阳崇拜的主题^[62]。可以看出弓形格剑纹饰与长江流域神人兽面纹所蕴含的太阳神崇拜可能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年代相隔久远、地域差距较大,时空之间的演变轨迹并不十分清晰。

这一构图方式也表现在弓形格剑起源地发现的广南普圈村铜当卢纹饰中,铜当卢应为西汉晚期句町文化遗物,是汉式器形与本地纹饰的结合。其正面纹样主体为一两眼凸出、鼻梁竖起、牙齿暴突的三角形人面,头顶鼻梁上端中间为三尖柱形、两边有数道外撇的火焰状头发^[63],与三星堆二号坑的铜兽面特征及头顶装饰一样(图三:9)^[64],火焰状头发与铜鼓翎眼纹和百色河1号剑人面的上冲头发相似。三星堆文化虽在长江流域,但受中原二里头文化影响较大,其兽面纹来源于中原。这种兽面是商周常见兽面纹(或称饕餮纹)的一种,源于良渚文化的鸟祖神像,具有共同的文化象征母题^[65]。因此人面或兽面表现的是太阳神的不同形象,因中原与南方文化差异所致。人面下为两组夹住人面的长身卷尾形浅浮雕双鸟纹,地纹为细密的卷云纹,显然是天空中四鸟夹飞太阳神形象的生动写照,与铜鼓鼓面四鸟绕日的纹样相似,延续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以来双鸟夹飞太阳神的布局和象征意蕴。由此可见,双鸟(或四鸟)载负太阳神飞翔的图案是东南地区太阳神鸟崇拜传播至越南北部和西南后与本地文化结合的产物,在石寨山型铜鼓、铜当卢、弓形格剑上有形状、构图和含义相近的纹饰。除双鸟(或四鸟)载负人面外,其他一些细节也有相似之处,如纹饰的刻划极为繁缛细密,似乎与良渚文化玉器和吴越文化青铜器的纹饰风格相似。而弓形格剑和铜当卢鸟底端均呈尖刺状,或许也是太阳耀眼光芒的写照,也都有表现天空的卷云纹。百色河2号剑和石滩剑卷云纹中还有一只蛙形动物,与石寨山型晚期铜鼓开始出现的鼓面蛙塑可以对比,表明它们之间隐约存在的相互联

系,只是已无法确知其内涵。

剑茎基本为几何纹,A型和D型为简单平行折线纹和卷云纹,D型虽然纹饰细密,满布茎部,但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似乎为相对简单的装饰,并无具体含义。而C型则明显地变化多样,以百色河1号最为繁复(图三:3),虽然难以准确判断其内涵,但该纹样主体部分为中间的细长尖状山形和两边延伸到茎首圆环下的细长柱,这一形状近似于广南铜当卢人面额头上的三尖柱形,兽面纹上也普遍出现。兽面纹头顶的这种三尖柱被释读为太阳柱,是太阳升起时和落下前出现的柱状光晕,应该是太阳出于扶桑一类的大树传说的起源^[66]。山形和两边柱形的底部中央连接一个下端为圆球形的细长柱,底部两边也向下连接近椭圆形,圆球形和椭圆形上都有卷云纹,可能是暗示着直通天顶的神树,这种通天神树的信仰在东亚萨满文化中普遍存在。另外,C型茎部上段两侧有“山”字形鋸牙突起,这种鋸牙在商周青铜器和玉器上大量发现,是良渚文化“介”字形结构的衍变,将具象图案化鸟纹转换为抽象的鋸牙鸟纹,其内涵为喻鸟示天,显示其通天的功能^[67]。剑茎鋸牙的位置位于象征神树的三尖柱上部和象征太阳的双环下部,与剑身双鸟夹人面象征的双鸟太阳神共同表达了这一题材所包含的双鸟载日神飞升于天的意蕴。而“山”字形鋸牙在华南和西南各地玉块上有不少发现,是中原夏商礼玉文化经长江中游和湘赣地区逾五岭逐次南渐华南的产物^[68],各地不同器物上发现的鋸牙形状也是太阳神鸟文化在华南等地普遍流传的证据之一。茎部下段的卷云纹也可能是天上云朵的写照,而向上弧曲的弓形格与向上卷曲的卷云纹一样可能是天界的象征,与人面周边和下部的卷云纹寓意一致。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弓形格剑的纹饰表现了一个完整的宗教信仰题材,大致象征着双飞鸟托载太阳神由神树飞升至天顶的含义。石寨山型铜鼓也有人面、鸟纹、三角纹、云雷纹、栉纹等纹饰,与弓形格剑纹饰的含义相通,是东南地区鸟、日结合的太阳神崇拜在华南、西南和越南北部广泛传播的结果^[69]。制作精致并有太阳神图案的弓形格剑显然不是普通人所能使用的,应该是部族首领专用的兵器,暗示其有与最高神灵——太阳神沟通的本领,也有作为军权与宗教权的象征功能。而它在周边其他区域的出现可能与句町民族与同属百越族群的其他民族上层的往来馈赠有

关。此外,石壁剑剑身两面人面纹略有大小差异,几何纹也有三角形和卷云纹的不同,可能代表男、女性别之差异^[70]。这种具有阴阳属性的两面神形象在肖家屋脊文化的玉人像上也有体现^[71],而玉人也是太阳神的写照,可见这种文化传承的关系是较为清晰的。

四、结语

通过对人面弓形格铜剑的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它是流行于战国至西汉中期的一种形制特殊的铜剑,各地发现的弓形格剑应该都是由滇东南、桂西北地区的句町文化制作并传播到其他地区,其纹饰包含着太阳神崇拜的宗教信仰。

宏观来看,人面弓形格铜剑融合了北方草原和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不同特征而成,是东北至西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与东南至西南百越文化传播带在云贵高原交汇后的产物,从中可以窥见相距遥远的不同文化之间碰撞、融合的现象。

- [1] a. 邓聪:《人面弓形格铜剑刍议》,《文物》1993年第11期; b. 邓聪:《香港石壁出土人面弓形格剑试释》,香港市政局等编《岭南古越族文化论文集》,香港市政局1993年; c. 邓聪:《再论人面弓形格铜剑》,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编《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 [2] a. 蒋廷瑜:《广西所见人面弓形格铜剑》,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广州文物考古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b. 蒋廷瑜:《岭南地区的人面弓形格铜剑》,《收藏家》2003年第3期。
- [3] 同[1]c。
- [4] 同[2]a。
- [5] 刘文、汪燧先、熊启校:《广西柳江县出土春秋战国青铜器》,《文物》1990年第1期。
- [6] 同[2]b。
- [7] 黄启善:《广西灵山出土青铜短剑》,《考古》1993年第9期。
- [8] 同[2]b。
- [9] 同[2]b。
- [10] 广州市文物管理处:《广州郊区暹岗古遗址调查》,《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年。
- [11] 同[2]b。
- [12] 高州博物馆藏品。
- [13] 同[1]a。
- [14] 同[1]b。
- [15] 同[1]b。
- [16] 同[2]b。
- [17] [越]黎文兰等编著、梁志明译:《越南青铜时代的第一

- 批遗迹》，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内部资料），1982年，第102页。
- [18]同[17]。
- [19]百色右江博物馆藏品。
- [20]蒋廷瑜：《广西考古通论》，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177页。
- [21][日]松井千鹤子著，唐虹、孙晓明译：《越南北部出土的青铜戈》，《东南亚》1987年第1期。
- [22]童恩正：《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戈的研究》，《考古学报》1979年第4期。
- [23]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昆明羊甫头墓地》（卷壹），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9—130页。
- [24]同[10]。
- [25]同[5]。
- [26]同[1]b。
- [2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考古》1995年第9期。
- [28]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宁蒗县大兴镇古墓葬》，《考古》1983年第3期。
- [29]云南省博物馆保管部：《云南永胜金官龙潭出土青铜器》，《云南文物》1986年第19期。
- [30]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69—71页。
- [31]霍巍：《试论西藏及西南地区出土的双圆饼形剑首青铜短剑》，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张忠培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4年。
- [32]同[30]，第185页。
- [33]同[1]b。
- [34]贺县博物馆：《广西贺县龙中岩洞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 [35]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树木岭战国墓、阿弥岭西汉墓》，《考古》1984年第9期。
- [36]同[1]a。
- [37]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
- [38]a. 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中国古代铜鼓》，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43—49页；b. 广南句町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句町国史”简介》，《云南壮学》2011年总第2期。
- [39]同[1]a。
- [40]蒋廷瑜：《右江流域青铜文化族属试探》，《广西考古文集》（第三辑），文物出版社2007年。
- [4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泸石石洞村大逸圃墓地》，云南科技出版社2009年，第107—109页。
- [42]李昆声、黄德荣：《再论万家坝型铜鼓》，《考古学报》2007年第2期。
- [43]蒋廷瑜：《羊角钮铜钟初论》，《文物》1984年第5期。
- [44]彭长林：《句町文化及其族系研究》，中共西林县委、县人民政府等编《句町国与西林特色文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 [45]黄德荣：《云南羊角编钟初探》，《云南文物》2004年第2期。
- [46]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边境地区（文山州和红河州）考古调查报告》，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年，第44页。
- [47]同[46]，第55页。
- [48]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元江江轻打篙陡青铜时代墓地》，《文物》1992年第7期。
- [49]同[40]。
- [50]同[2]b。
- [51]同[1]b。
- [52]贺刚：《湘西史前遗存与中国古史传说》，岳麓书社2013年，第280—288、413—417页。
- [53]黄厚明：《商周青铜器纹样的图式与功能——以饕餮纹为中心》，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80—87页。
- [54][日]林巴奈夫著、常耀华等译：《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三联书店2009年，第59—62页。
- [55]同[53]，第87—118页。
- [5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 [57]徐良高：《中国三代时期的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以神人像类文物所反映的长江流域早期宗教信仰传统为例》，《考古》2014年第9期。
- [58]郎剑锋：《吴越地区青铜时代的太阳崇拜——一种青铜杖饰的文化解析》，《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 [59][奥]弗朗茨·黑格尔著、石钟健等译：《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77—280页。
- [60]彭长林：《石寨山型铜鼓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十三辑），科学出版社2018年。
- [61]朱乃诚：《从龙山文化四种玉器的文化传统看濮阳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的重要地位》，《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5期。
- [62]王仁湘：《古代艺术中的“对鸟”主题——从史前玉佩饰说起》，《中华文化画报》2011年第4期。
- [63]同[46]，第44页。
- [6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
- [65]同[53]，第117页。
- [66]同[54]，第107页。
- [67]张明华：《扉棱、鋬牙的关联、起源与意义》，《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九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 [68]张强禄：《论有角玉玦的起源和传播》，《文博学刊》2019年第2期。
- [69]同[60]。
- [70]同[1]b。
- [71]王仁湘：《正反相生：史前阴阳互生图像略说》，《中原文物》2020年第5期。

A Study of Bronze Daggers with Human Faces and Bow-shaped Guards

PENG Chang-lin¹ FU Zhen²

(1.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2. Guangx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Archaeolog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Abstract: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bronze swords with human faces and bow-shaped guards reveals that these distinctive weapons were prevalent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mid-Western Han Dynasty. These swords, found in various locations,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produced by the Gouding Culture in the southeastern Yunnan and northwestern Guangxi regions before spreading to other areas. The decorations on these swords reflect religious beliefs, particularly the worship of the Sun God and bird totems.

Key words: bronze swords with human faces and bow-shaped guards; form; period; Gouding Culture; Sun God worship

(责任编辑:黄苑;校对:张平凤)

南京博物院举办“爱琴海的荣耀——古希腊文明特展”

2024年6月6日,“爱琴海的荣耀——古希腊文明特展”在南京博物院特展馆2楼8号展厅开幕。

古希腊以其独特的哲学思考、科学探索、政治理念及艺术创作,为世界文明贡献了诸多宝贵的财富。哲学上,它开创了西方哲学理性思考与探索真理的先河;科学上,它孕育了数学、物理、天文等现代科学的萌芽;政治上,它促进了民主与法治等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艺术上,它创造

了雕塑、建筑、戏剧等不朽的杰作。本次展览精选来自希腊14家文博机构的270件/套珍贵展品,通过“文明肇启”“火种播迁”“全面繁兴”以及“雄主时代”四个部分,全方位展示古希腊的璀璨文明。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段历史的长河,感受古希腊文明的智慧与光芒,共同探寻人类文明的辉煌与未来。

(南京博物院)